

供给侧改革与内涵式企业国际化

刘建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内容提要: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步入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期。供给侧改革就是要通过各种改革措施,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减少无效产出和低端供给,使市场能够较快地回归到有效产出水平,增强供给侧对需求端变化的适应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去一补一降”涉及与生产要素相关的所有领域,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国际化是企业作为供给主体的主动战略拓展行为,是可以引致宏观层面供给总量和供给结构变动的微观经济行为。本文区分了外延式企业国际化和内涵式企业国际化,并指出内涵式企业国际化与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补一降”的五大任务在战略目标上完全契合,剖析了其促进供给侧改革的内在机理。在分析当前对外投资形势和面临的新环境基础上,提出了当前鼓励企业内涵式国际化、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企业国际化;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C9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6)10—0014—11

供给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发力点,这一结构性改革是根植于开放体系中的系统工程,是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配置与价值实现的产业升级过程,而绝不是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零和博弈。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国际化是企业作为供给主体的主动战略拓展行为,是可以引致宏观层面供给总量和供给结构变动的微观经济行为。那么,企业国际化是否天然符合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初衷?什么样的企业国际化才与供给侧改革的战略目标相契合?在当前环境下,需要什么样的对外投资政策支持企业“走出去”,以促进供给侧改革?本文力图通过理论分析回答这些问题。

一、理论基础

1. 供给侧改革的内在逻辑

2015年底,自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多次在不同场合对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和战略路径进行了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供给侧改革要抓好“三去一降一

补”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已经在实际工作部门取得了广泛共识,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和实现路径方面,仍存在“去市场化”的误区和政策扭曲的情形。

供给侧改革立足于追求更高质量的经济。而改革的隐含假设是,经济发展存在路径依赖和市场失灵。当市场中的大量企业无法预知要素结构和需求端的变化时,惟有通过公共政策的纠偏才可以打破这种路径依赖,而且,社会福利的损失完全可以通过改革加以避免。例如,国家可以通过出台创新激励政策、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等,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防止产业低端锁定,减少环境损失。金碚(2016)指出,市场失灵主要是由于结构性障碍导致市场调节机制的系统性失效。因此,从供给侧着力的对策措施是实体性、长期性和结构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根到底将体现在供给系统对于需求变化的更高弹性方面。李佐军(2015)指出,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就是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通过全面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可

收稿日期:2016-07-21

作者简介:(1978-),女,山东青州人,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是企业国际化。E-mail:ljlcase@126.com。

持续发展;微观层面来看,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提高企业主体对市场反应的调节能力和适应能力,在顺应经济规律的同时,让市场及时出清,避免系统性风险;通过新技术、新业态的引入,使企业能够向市场提供代表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更加切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供给侧改革不是忽视需求,而恰恰是要重视、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更高品质的需求,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匹配程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重视并满足需求端的变化,更要通过供给侧创新引领市场需求,达到一种“供需平衡”的理想状态(胡鞍钢等,2016)。比如,在智能手机开发出来以前,所有手机厂商设计的目标就是满足人们接打电话的需求,而目前,智能手机显然已经被赋予了多重功能,且手机智能化创新仍然看不到边界,这一边界的探索是由供给端引领的,而在全新的领域,需求端处于不自知状况。这就是典型的供给侧改革带动经济增长的例子。

显然,供给侧改革的思路绝不是要回归到萨伊的古典自由主义,没有政府的作用何谈“改革”。供给侧改革也不同于美国里根政府所倚重的供给学派思路,虽然都着眼于刺激经济增长,但我国当前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主要任务是化解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而供给学派的出发点则是解决滞胀问题,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其症结仍然在货币端;而我国供给侧改革所针对的症结在产品端和技术端,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供给更好地满足高品质的需求,而不是一味强调供给,忽视需求。

通过学理上的梳理可知,当前,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步入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期,供给侧改革就是要通过各种改革措施,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减少无效产出和低端供给,使市场能够较快地回归到有效产出水平,增强供给侧对需求端变化的适应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去一补一降”涉及与生产要素相关的所有领域,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单纯字面意义上的理解,都可能导致政策实施效果与政策目标背道而驰。当前,尽管存在各种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但世界经济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融合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供给侧

改革也必然是开放环境下的改革,这一结构性改革必然是立足于企业国际化背景下的改革。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样的企业国际化符合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初衷。

2. 内涵式企业国际化

企业国际化,是指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由国内经营向跨国经营乃至全球经营发展的过程。国际化是一个双向过程,它包括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两个方面。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企业的能力是伴随着中国逐步向国外开放市场以及中国企业不断向海外市场拓展而不断提升的。事实证明,过度保护并不能换来产业的加速成长。在开放环境下,从竞争中学习才是企业国际化成长之道。当前,从整体上而言,中国企业已经在内向国际化基础上,进入全面外向国际化的进程。历史数据表明,出口导向企业比非出口导向企业的生产效率增长更快。反过来,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企业,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就更强,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出口及后来的对外直接投资(刘建丽,2009)。

不管是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国际化都可以区分为粗放式国际化和内涵式国际化。前者是一种简单的基于资源和要素低成本投入的、技术范式维持不变的国际化,是创新停滞的简单规模外溢,或者是预算软约束下的盲目投资,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国际化;与之相对应,内涵式企业国际化则是立足于本国比较优势基础上,不断创新基础上的梯度产业转移和技术寻求型投资,是科学决策基础上的、立足于能力提升的可持续的国际化。换言之,当企业国际化伴随着企业向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攀升,则这种国际化即可称之为内涵式企业国际化。内涵式企业国际化并不排斥企业对外转移过剩生产能力,但这种转移必须伴随持续的创新投入,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来看,国外产业复制和国内产业升级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如果创新停滞,则这种国际化就变成企业延缓衰败的权宜之计。

粗放式国际化虽然在短期内能够带动产品和设备出口,表面上看是“去产能、去库存”的有效方式,但短期的饮鸩止渴并不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随着贸易壁垒的增加、国际市场需求标准的提高,这部分外销的产品回流国内,只能加重产

能过剩。况且,中国的低要素成本优势正在丧失,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动恰恰为中国调整产业结构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在出口产品结构上,“高也成、低也就”的理想状态难以长期保持。

既有研究表明,内涵式国际化能够提高国内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改革开放初,出口导向企业比非出口导向企业的生产效率增长更快(Perkins, 1997)。实际上,那时候国际化的制度红利刚刚释放,国内市场也还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粗放式国际化和内涵式国际化的分界尚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之后,惯性的粗放式出口难以为继,简单的出口加工型企业的边际报酬呈递减态势,而一些主动的跨国投资却可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Wei zhao等(2010)利用1991—2007年中国在八个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向量自回归,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3. 内涵式企业国际化促进供给侧改革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表现

显然,并非所有的企业国际化行为都能够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预算软约束下的国有企业跨国并购,导致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使国有企业改革背负了沉重的财务负担,无疑不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些不能主动提升产品品质、进行产品结构升级的外贸型企业,在传统出口市场“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中,也会逐渐丧失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因为中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正在发生内在变化。相比之下,内涵式企业国际化能够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战略空间,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具体体现在内涵式国际化与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五大任务在战略目标上完全契合。其内在机理如图1所示。

(1)企业出口贸易结构变动倒逼产业结构调整。2015年全年,中国出口总值14.14万亿元,同比下降1.8%。中国出口机电产品价值8.1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增长1.2%,占出口总值的57.7%,较上年提升1.7个百分点。同期,纺织品、服装、鞋类、箱包、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总值2.93万亿元,下降1.7%,占出口总值的20.7%。原材料中,钢材出口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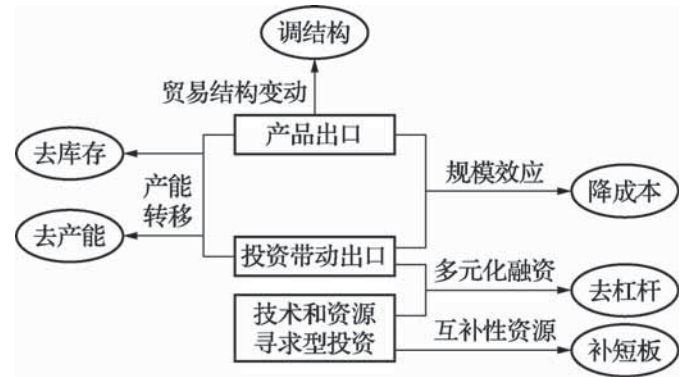


图1 内涵式企业国际化促进供给侧改革的内在机理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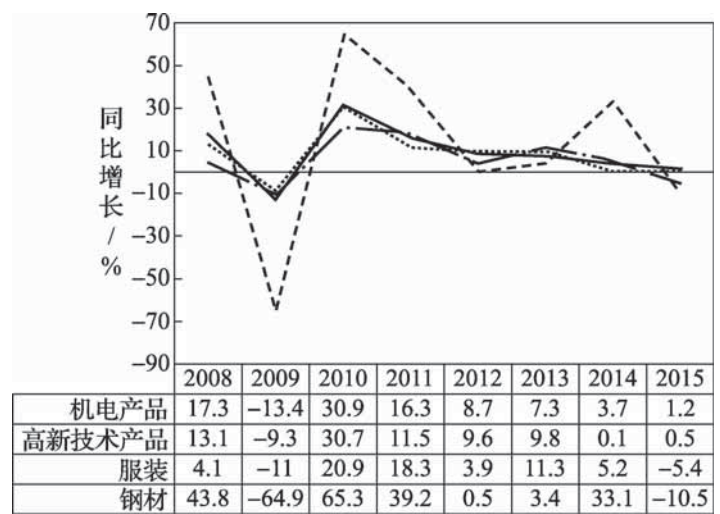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出口产品增长率
数据来源:海关统计数据

10.5%。图2列示了几种产品出口的增长情况。可以说,国内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遭遇的反倾销也更为严重,因而出口形势也比较严峻。

当然,产业间出口增长率相对变化不足以表明产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化。因此,本文分别计算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的服装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及两类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如图3所示)。结果表明,机电产品RCA近年来略有下降,但基本保持在了1.25以上,表现出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服装产业仍然显示出极强的国际竞争力(RCA(2.5)),但RCA指数下降明显。RCA指数作为某类产品出口的相对比例,其数值的下降代表该产品在一国出口产品中相对地位的下降。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标则能够直观反映一国某产业国际市场地位的变化。从图3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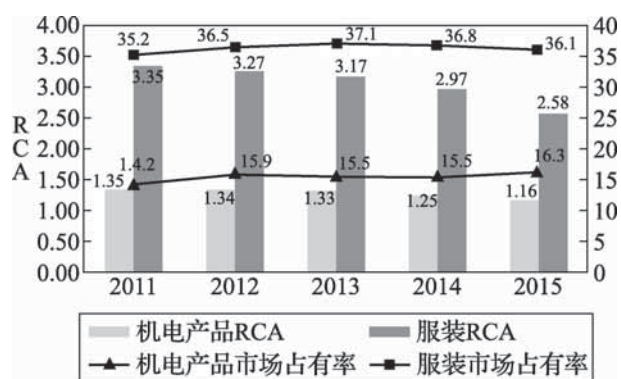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机电产品和服装国际竞争力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数据计算

看出,在2013年达到市场份额高点之后,中国出口服装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近两年连续下降,而机电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则表现出上升趋势。显然,当前技术水平下,中国出口商品的产业间相对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原材料行业而言,通过出口可以转移一部分过剩产能。但长期来看,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加工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均有所削弱。推动这些产业向海外转移生产能力的同时,利用规模收益促进国内生产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方向跃升,才是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企业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动趋势,已经在倒逼产业结构升级,从而能够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企业海外设厂是“去产能、去库存”的有效途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规避贸易壁垒的有效途径。一些企业通过在主要目标市场或中转国设立加工制造基地的方式,绕过了针对中国企业的贸易壁垒。企业海外设厂有三种方式:当地取材当地生产、全散件组装、半散件组装。第一种方式除了能带动设备出口外,对国内产能利用作用不大,是一种生产能力的转移或复制。但后两种组装生产方式,能够大量带动国内原料和半成品出口,对于“去产能、去库存”效果显著。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相较发达国家具有明显优势,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配套优势也非常明显,因此,大量海外设厂的中国企业都选择了海外组装的方式,通过在国内生产大量零部件和半成品,充分利用国内生产成本优势。同时在当地完成终端生产,有效规避贸

易壁垒的同时,实现了产能转移。对于中国产能过剩明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加工产业,海外设厂可以有效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要素成本优势,同时规避市场目标国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是当前“去产能”的重要途径。这些产业对外投资转移富余产能,能够获取规模效益,为产业升级提供腾挪空间和资本支撑。

(3)企业“走出去”发挥规模效应有利于企业降低平均成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中,降成本是企业提高市场适应能力的一种普遍性的革新措施。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在任何发展阶段、任何时点,都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来提升自身竞争力。从波特提出的三种竞争战略来看,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专一化战略并非是平行和相互独立的;从实践来看,低成本是各种战略的根基,即便是差异化战略,也存在降低成本的空间,况且,难以被模仿的差异化并不普遍。虽然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容量的消费市场,但大规模市场面临的竞争往往也更加激烈。因此,企业对外投资,向海外拓展市场空间,有利于企业发挥规模效应,降低企业平均成本,提升企业持续竞争能力。尤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先期投入和研发投入大,必须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才能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才可能支撑持续的创新投入,如领先的医药制造企业,无一不是全球化公司。

(4)技术和资源寻求型的并购能够补充企业短板。在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重中,相对于“去产能、去库存”这些后发的防御型措施,补短板则属于先导型的主动调整型措施。并购式投资是重要的技术转移渠道(Sourafel Girma等,2007)。企业开展跨国并购,寻求互补性资源与能力,正是企业提升自身能力、改善供给结构的重要途径。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两条主线之一就是企业对外投资,寻求互补性资源与能力。近来美的集团要约收购德国领先的机器人制造商库卡集团股份,就是典型的技术寻求型跨国并购。这样的并购对于快速提高中国企业能力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提升了单一企业的技术能力,对整个产业的能力跃迁也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显然,并非所有技术寻求型

投资都是内涵式国际化,盲目的、对并购标的考察不充分的、不顾企业发展阶段和吸收能力的跨国并购,恰恰是粗放的国际化。这样的国际化不仅不能“补短板”,反而会拖累企业母体,为国内产业成长带来负面影响。

(5)满足高端市场需求有利于推动企业产品升级。供给侧改革绝不是不顾消费需求盲目生产、盲目创新。而是要通过改革满足潜在的更高水平的需求,防止企业因着眼于眼前的市场而陷入低端需求陷阱。反过来,更高标准的客户需求能够牵引企业改进产品性能、进行技术创新。一个简单的例子,同一家服装厂生产的服装,出口的产品就比内销的产品执行更高的安全标准,这就是国外需求标准更高导致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而言,企业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客观而言,一些国内所理解的技术壁垒,实际上就是国外市场对中国企业提出的更高的技术标准要求。如果企业仅从成本角度考虑,反而会陷入低端需求陷阱,失去创新的最好时机。前文数据显示,通过企业出口转移国内过剩产业产能在短期内并不现实,但积极推动这些企业“走出去”,能够推动这些企业加快技术升级和产品升级步伐。而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走向海外市场则能够更早地提高企业适应全球市场的能力,有利于企业快速成长。

(6)优势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的市场化融资有利于社会整体降杠杆。实体经济领域降杠杆的根本目标是减少不良贷款,提高金融资本与优势生产资本的匹配程度。优势企业对外投资尤其是海外并购的融资完全是市场化的金融资源竞争过程,这种优选机制是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对于部分股权并购而言,被并购方非常关注并购实施后企业的运转情况,因此,对于收购方的资产负债情况都要进行专门考察,对于双方认可的并购项目,被并购方还有可能在其所在国进行融资担保,实现并购资金的多元化,这种方式本身就降低了国内金融机构的贷款比重和放贷风险。有些企业则通过海外子公司或海外上市的方式,实现海外融资,降低海外项目对国内运转资金的占用,有利于国内社会整体降杠杆。

二、中国企业国际化最新进展

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保持持续的强劲增长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企业在世界投资舞台上表现优异。经过2011年的低迷之后,2012年以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流量实现了持续回升。2012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达到772.2亿美元,同比增长28.55%。之后三年,连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2015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180.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占国际对外投资总额的11%左右,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的三分之一。虽然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较大,但从投资增长率的角度分析,美国企业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除2011年外,对外投资增长率均为负值,呈明显的负增长趋势。与之相比,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在2007—2015年以年均26%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如图4所示)。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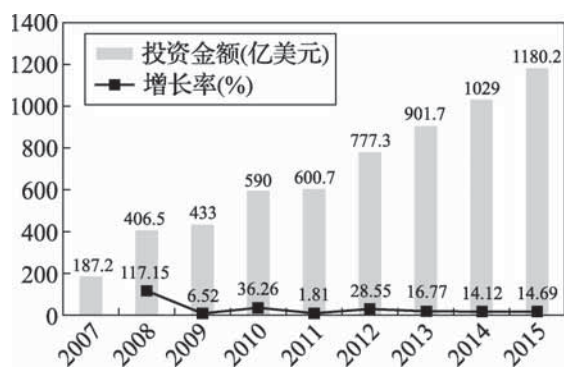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2. 近年来跨国并购方式所占投资流量比重呈下降趋势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保持了快速增长,但跨国并购金额却保持相对稳定,尤其是最近三年,占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如图5所示)。2013—2015年,直接投资中的跨国并购金额占比依次为37.5%、31.6%和28.6%,呈现下降趋势,相应的绿地投资方式占比明显上升。当然,跨国并购交易额还包括了海外融资部分,但



图5 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并购方式投资流量增长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从统计数据来看,企业自有资金和国内融资部分一直占跨国并购交易额的绝大部分。2015年,跨国并购交易额的84.3%都是企业自有资金和境内融资完成的,海外融资比重不高。这种情况并不必然表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热情的降温。尽管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总体规模正在迅速增长,但由于跨国并购交易需要匹配合适的并购标的,并且受到东道国反垄断法和国家安全审查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并购的实际交易额难以在年度区间内发生快速上涨,企业要满足全球战略的需要,必然寻求以绿地投资或追加投资的方式达成跨国经营目标。

3. “组团出海”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方式

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意识到跨国经营的必要性,但国外经营环境的复杂性和蕴含的巨大风险使大多数企业望而却步。即便是一些行业领军企业,在跨国经营中也难免由于不可控的外部风险而遭遇重大损失。因此,近年来,一些企业改变了单打独斗的方式,转而选择与相关企业“组团出海”的方式对外投资。例如,中国五矿集团携手新国际和中信金属投资建设的拉斯邦巴斯铜矿项目,已成为中国企业在秘鲁投建的最大矿产项目。有些中小企业通过组建联盟的方式,成功实现“集群出海”,例如,由江苏省纺机协会牵头、由一家贸易企业和四家纺机制造企业共同发起的中国苏纺机联盟(SUTEX),已经成功地在目标市场设立海外窗口,对中小企业出口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另一个集群出海的重要载体就是近年来兴起的境外经贸合作区,这一“企业首创、政府推动”的

园区投资方式,已经初显成效。据商务部数据,截至2015年9月底,我国企业在建69个经贸合作区,建区企业累计完成投资67.6亿美元。入区企业1088家,其中中资控股企业688家,累计实际投资99.2亿美元;其中,53个经贸合作区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完成投资超过140亿美元。

4. “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明显增多

随着国家战略支持和企业自身能力的提升,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额增长较快。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达到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占总额的12.6%,增速超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3.5个百分点。投资金额较大的国家有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老挝、印尼、俄罗斯和泰国等。截至2015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规模集中在1亿~10亿美元的投资案例数高达407起,10亿~100亿美元的大规模投资也比较多,达到121起。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领域集中在采矿业、交通运输及制造业。2016年一季度,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5.9亿美元,同比增长40.2%。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潜力的释放以及国家政策的支持引导,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额有望保持快速增长。

5. 投资目的地更加集中,发达国家成为主要目标国

截至2014年底,中国1.85万家境内投资者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3万家,分布在全球186个国家(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域分布高度集中,2014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存量占总量的近90%。2014年中国企业对欧洲的投资增长迅猛,从55.47亿欧元飙升至120.98亿欧元,投资额翻番。2015年,我国内地对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和日本这七个主要经济体的投资达868.5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73.6%。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开曼群岛、美国、新加坡、英属维尔京群岛、荷兰、澳大利亚等。对前10位国家和地区投资累计达到1016.3亿美元,占到全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86.1%。对东盟和美国投资增长较快,同比

分别增长了60.7%和60.1%，对欧洲投资也保持了40%以上的高速增长。这显示出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两端拓展战略空间的趋势。

三、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新环境

1. 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各国经济在分化中前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世界经济发展,危机之后各国经济增长进入震荡调整期。2011年,全球经济在震荡中开始缓慢复苏。从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世界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来看,最近两年,美国表现相对较好,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全年表现出强劲复苏的态势,连续两年保持了2%以上的年度增长率,但从季度环比增速来看,美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仍不牢固。欧盟经济虽然一直徘徊在零增长的边缘,2016年的英国脱欧事件,又给原本举步维艰的欧盟经济增长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但欧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仍在,季度环比增长率也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水平。日本经济则一直处于大起大落的状态,2014年实际GDP为零增长,2015年实现了1%左右的的增长。从季度环比增长率来看,基本围绕零增长线上下波动,目前仍未看到企稳迹象(如图6所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乏增长亮点。中亚五国中,乌兹别克斯坦同比增长8%,增速列全球之冠;土库曼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实际增长6.5%。东盟和南亚国家表现也可圈可点。东盟2015年经济增长率约在4.4%以上,预计在2016年将增长4.9%。其中,印度、缅甸、越南表现抢眼,最近两年保持了7%左右

的增长;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最近两年经济增长也接连创出金融危机以来新高。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资本投入的边际产出在提高,这些新兴经济体正在释放增长潜力。

2. 外需不振和贸易保护主义并存,中国出口贸易进入“新常态”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破坏了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国际经济总体复苏乏力,导致全球贸易进入深度调整期。各国急于振兴国内经济的结果是,全球出口贸易增长率下降与贸易保护主义形成了负面的相互强化。2014年以来,全球出口贸易增速经历了短期的反弹之后,在2015年再次遭遇深度回落,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货物出口增速都大幅下滑。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2014年,中国货物出口总值14.39万亿元,增长4.9%;2015年,货物出口总值14.14万亿元,下降1.8%。应该说,中国出口贸易已经进入“新常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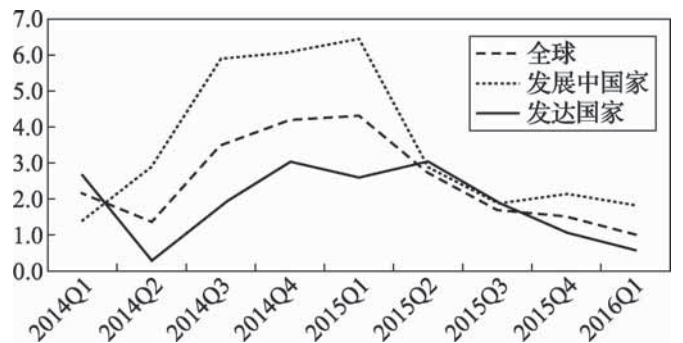


图7 世界货物出口贸易增长率(%)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

中国出口贸易下滑的主要原因至少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世界经济增长不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需求双双减少。二是各国为保护本国实体经济所祭出的贸易保护主义战术,减少了国际贸易流量。2009年上半年开始,国外技术性贸易限制措施明显增多。由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商品出口来源地,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自然比较严重。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3年,美国对中国企业采取的反倾销制裁税率在70%左右,一年后增长到120%左右,而2016年猛增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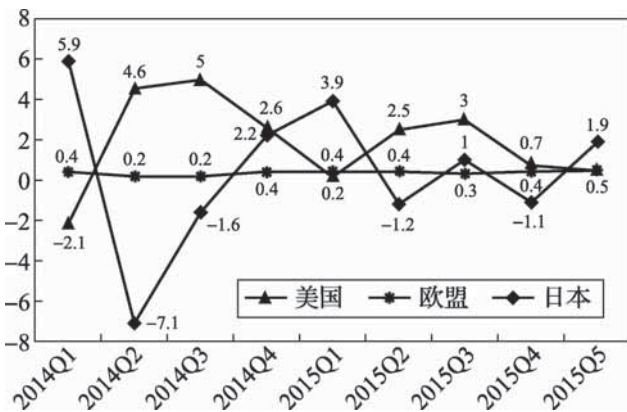


图6 世界主要经济体GDP季度环比折年率(%)

数据来源:美国统计局、欧盟统计局、日本统计局

260%左右,反倾销反补贴制裁税率猛增至500%以上。其中,国有企业获得单独优惠税率的机会微乎其微。这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三是中国产品所享受的“优惠待遇”正在失效。近年来,日本、加拿大、欧盟不断削减对中国的普惠关税待遇产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客观上有所削弱。四是中国作为迅速发展的经济体,生产成本逐渐提高,在国际贸易中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性出口替代影响。这一因素将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中国出口贸易增速和出口贸易结构。

3. 金融危机导致国外企业资产缩水,但跨国并购面临投资保护主义障碍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资产规模大幅缩水,企业债务规模增加,这客观上降低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本,但中国企业的大规模海外并购也引致一些国家的投资保护主义,尤其是针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投资,发达国家时以“竞争中立”或“国家安全”等为由对其予以阻挠,设置了种种障碍。可以预见,形式多样的投资壁垒短时期内不会减少,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需要做好应对各种挑战的准备。2009年,中铝向澳大利亚力拓增资195亿美元的计划因对方毁约而功亏一篑,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目标国对中国企业投资目的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无疑起了压倒性作用。2009年,同时有中国中铝、中国五矿集团和湖南华菱集团三家中国国有企业向澳大利亚海外投资审批委员会FIRB申报了对澳大利亚矿业公司的巨额投资,这无疑引起了澳政府和反对党议员的疑虑和反对,最终导致中铝增资计划搁浅。另外,华为这样的通信企业,在美国的收购屡次因“国家安全风险”被否决,也是美国推行投资保护主义的结果。

4. 区域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投资一体化格局正在加速重构

美国主导的TPP谈判已达成基本协议,TTIP谈判也在进行之中,这两大自贸协议如果生效,将给国际贸易和投资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中国也在大力推动国内自贸区试点的基础上,谋划国际自贸区战略,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越来越多。2015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对加快自贸区建设做出三个

层次的规划:一是加快构建周边自贸区,力争和所有与中国毗邻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自贸区;二是积极推进“一带一路”自贸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建自贸区,形成“一带一路”大市场;三是逐步形成全球自贸区网络。截至2016年初,我国已签署并实施的自贸协定共14个,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自贸伙伴遍及亚洲、拉美、大洋洲、欧洲等地区。目前,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也已进入最实质阶段。随着这些双边、多边协议的推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环境将发生巨大变化,相关投资便利化的制度性安排将为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平台。

四、鼓励内涵式企业国际化,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并非所有的企业国际化行为都能够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从对外经济政策上,有效识别并鼓励内涵式企业国际化行为,有利于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度。差别化政策的实施,在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有利于推动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 加快制度创新,鼓励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出去”

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决定着中国在未来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发展壮大这些产业,是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这些产业更早地吸收先进技术知识,更早参与国际高水平的竞争,才能够更快地提升其自身竞争力。在双边和多边投资协议框架内,积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口和对外投资,优先支持高铁、无人机、电子通信这些中国已经具备相当竞争优势、具备战略成长性的产业对外投资,发挥规模效应,降低企业平均成本。对于智能机械、工业机器人等中国具备强大生产能力,但技术上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的成长性产业,要为企业开展海外并购创造有利条件。如在政策性银行成立海外并购基金。加大对创新型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的融资支持。由于中小企业的信用基础相对薄弱,获取商业贷款比较困难。政府可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专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具备一定技术实力的、具有战略先导意义的中小企业提供优惠的对外投资融资支持。

政策性银行可设立中小企业海外拓展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境外贸易营销网络建设、生产性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鼓励中小企业开展各类国际标准认证工作,并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另一方面,推动中小企业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鼓励中小企业到海外上市,不仅有利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融通资金,还有助于企业改善股权结构,提升国际影响力,更快地开展国际化战略。当前,应简化企业海外直接上市的审批程序,适当降低企业上市门槛,为企业海外融资创造有利条件。

2. 支持传统优势产业的国际化,提高中国企业的产业链控制力

中国具备传统制造优势的纺织、家电、机械等行业,在国际上具备相当的市场竞争力,但大量企业仍然处于间接出口和产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只有少数大型企业完成了从代工生产向自主出口和品牌国际化阶段迈进的转变。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使企业摆脱低层次的价格竞争,进入以创新和质量取胜的差异化竞争。一些企业长期采取间接出口、OEM出口的方式,丧失了获取品牌溢价的机会,面临产业链“低端锁定”的风险,难以在产品创新方面有所作为。从产业层面来看,这意味着大量生产资源的消耗没有带来可维持创新投入的价值增值。显然,这无关乎生产效率,而是由企业的商业模式所决定的。唯有通过品牌国际化,才能提高“中国制造”的国内增加值和产业链控制力。总体来看,中国传统优势产业的国际化是循序渐进的,行业领军企业的品牌国际化仍然面临很大困难,产业链控制力仍然较弱。支持这些企业的品牌国际化,有利于提高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政府开始重视打造中国产品和“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在一些重点国家播放宣传片和投放宣传广告,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今后,商务和外交部门可以借助国际展会等重要平台,集中宣传中国品牌,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充分调动行业商协会积极性,引导其设立行业品牌推广计划,并在国家层面予以专项扶持。与政府相比,商协会组织在促进海外投资活动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类组织熟悉本行业情况,掌握投资地信息比较快捷。此外,商协会在与投资地政府交涉、

沟通、谈判方面也具有优势。在推动品牌国际化方面,商协会组织应该大有作为。

3. 加强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宏观指导,提高企业抱团出海的成功率

当前,商务部批准设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通常选在要素成本低、资源丰富的国家(地区),由企业主导开发,吸引中国企业入驻投资。目前,大部分合作区运营情况良好,但也有个别项目暴露出定位不清晰、园区内产业关联度不高等问题。今后,国家可重点加强区域布局指导和国别风险指导,避免重复投资和盲目投资;结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协议及规划,谋划跨境经贸合作区及产能合作的主导产业;重点支持龙头带动型和集群支撑型产业集聚区项目,为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营造海外投资的产业支撑环境,充分发挥集群投资的产业链优势,提高企业海外经营的成功率。尤其是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面临国内压缩产能、对外投资无从下手的尴尬境地。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海外经贸区规划方面的积极性,以龙头企业为牵引,选择合适的投资目标国,牵头建立以产业聚集、产业配套为目标的海外投资产业园,引导中小企业以跟进方式投资。

4. 加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体系建构

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巨大风险,其中政治风险、战争风险等非商业风险是企业自身难以抵御和承担的。因此,国外政府纷纷建立境外投资保险机构,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保障,以政府之力量为企业跨国经营解除后顾之忧。如美国早在1948年就建立了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此后,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印度等国家也先后建立了类似机构。对我国企业而言,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它们“走出去”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但同时巨大的发展空间往往伴随着很高的风险特别是政治风险。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这一问题显得特别突出。我国企业已遭遇多起合同签订后目标国发生政治动乱导致合同作废的海外投资事件。因缺乏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的投资会损失殆尽,拖累企业母体的发展。因此,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尽早建立海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与保障体系。一方面,尽快研究对外投资保险立法的相关内容,为对外投资保险建立法律

制度框架;另一方面,在现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基础上,建立以对外投资风险担保为主要职责内容的保险公司,同时拓展对外投资风险担保的范围。通常保险公司追偿海外投资损失要以双边投资保证协议为基础,但我国签订的双边协议中,多数是与发达国家签订的,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来源主要在发展中国家,这与我国对外投资的现实需求不符。今后应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双边投资保证的磋商,并明确政治风险情况下的代位求偿权。

5. 通过多种方式化解某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

前文所述,经济发展迟滞和贸易保护主义正陷入相互强化的怪圈之中,要打破这种负向循环,需要各相关国加强多边和双边磋商,利用现有的和正在形成的经济合作平台,在协商基础上促进新的贸易秩序的建立。对于一些发达国家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进入该国市场肆意干涉,需要灵活对待。现实情况表明,所谓的“国家安全”“双反”都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其本意在于通过各种手段保护本国产业和核心技术,遏制中国相关产业的成长壮大。例如,2010年5月,华为曾斥资200万美元收购濒临破产的美国3Leaf System公司的技术资产,但事后该交易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以国家安全为由建议双方终止交易。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2011年2月19日,华为正式宣布放弃收

购3Leaf System公司。如此小规模收购也被扣上了“国家安全”的大帽子,美国对中国企业的防范可见一斑。面对不断增加的贸易壁垒和投资保护主义,有时仅通过政治交涉、谈判磋商、法律抗辩等手段来应对是不够的,建议商务部等国家部门必要时启动反制措施,如反补贴调查、产业损害调查等,充分应用《反垄断法》,向对方国家企业施加压力,以保护本国企业的合理利益。

6. 增强政府对企业海外投资的信息咨询服务

企业投资之前的信息咨询服务也应该纳入政府的服务范围。建议由商务部定期派遣投资环境考察团,调查国外投资环境,编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据库,建设统一的政府海外投资信息平台,为企业提供海外投资环境的相关信息。随着中韩、中澳等双边自贸协定生效进入实施期,协定一些对企业贸易和投资产生直接影响的条款,应尽快通过信息平台向企业传递。通过驻外使馆,设立经济商业情报中心,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信息情报等服务。同时帮助企业交流海外直接投资经验,协助进行投资分析,把握投资机会以及负责咨询等服务。鼓励企业参加国际会议,开展海外技术交流活动,扩大国际交流的范围。依托高等院校、法律中介机构及其他民间组织,积极发展咨询服务机构,广泛开展信息收集、分析研究、咨询和培训服务,为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专业咨询和法律咨询。

参考文献:

- [1] Mebratu Seyoum, Renshui Wu, Li Yang. Technology Spillovers from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The Case of Ethiopi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5, (33): 35 - 49.
- [2] Perkins, F. C. Export Performance and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s Coastal Provinces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7, 45, (3): 501 - 539.
- [3] Sourafel Girma, Richard Kneller, Mauro Pisu. Do Exporters Have Anything to Learn from Foreign Multinational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7, 51, (4): 993 - 1010.
- [4] Wei Zhao, Ling Liu, Ting Zhao. The Contribution of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to Productivity Changes within China 1991 - 2007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10, 16, (2): 121 - 130.
- [5] 胡鞍钢,周绍杰,任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J]. 北京: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2).
- [6] 金碚. 总需求调控与供给侧改革的理论逻辑和有效实施[J]. 北京:经济管理, 2016, (5).
- [7] 李翀. 论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政策选择[J]. 北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6, (1).
- [8] 李佐军. 准确把握供给侧改革需走出六大误区[J]. 北京:中国产业经济动态, 2015, (24).
- [9] 刘建丽. 中国制造业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9.

Supply-side Reform and Intensiv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LIU Jian-li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ASS, 100836, Beijing, China)

Abstract: Chinese economy under the new normal is entering the key period of economic growth, with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growth power conversion. Supply-side reform is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to reduce the ineffective output and low-end supply through a variety of reform measures. And the goal of this reform is to achieve a sound market clearance condition, and to improv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volved in all areas related to production factors, supply-side reform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In the market economy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an active strategic behavior of the enterprises as commodities suppliers, and also is a micro economic behavior which can lead to change of total supply and the supply structure at macro level.

This paper clarifies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extensiv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tensive one, points out the connotation of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fully fit the five tasks of supply-side reform, and analyzes the supply-side reforms promoting mechanism that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makes. Data shows that, in recent years,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maintains sustained strong growth, while the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demonstrate a decline in the proportion of investment flows. Going abroad in a cluster has become a new wa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globalization. Investment flow in the countries located i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vestment destinations are more concentrated,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become the main target countrie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new environment, th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s to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go abroad and to promote the structural reform on the supply-side.

Firstly, policies should be taken forth to encourage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to go abroad. Secondly, governmental guidanc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on 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 to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firms' entering foreign market in clusters. The state government can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of regional layout and the guidance of country risk, avoiding duplication of investment and blind investment, and focus on supporting the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industrial cluster projects. Thirdly, it is suggested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risk guarantee system. On the one hand, generate official overseas investment risk rating report, on the other hand, encourage commercial insurance companies to conduct 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business. Forthly, it is suggested to implement necessary counter measures to offset influence of the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investment protectionism in some countries. Fifthly, the government's information consulting services for enterprises to invest overseas should be enhanced. Finally, Give fully the rol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other 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and promote the enterprises to go abroad orderly.

Key Words: supply-side reform; intensive internationalization; policy recommendations

(责任编辑:舟 山)